
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与新变

——兼论徽商的衰落问题

梁仁志

【摘要】近代以降，徽商经营从“首重盐业”转变为“以茶为大宗”，徽州茶商在徽商中呈崛起之势。相较于传统徽州茶商，近代徽州茶商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经营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二是经营方式从重运销转向重产制，三是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不能简单视为传统徽商的中兴，它既是传统徽商实力之延续，也是徽商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近代徽州茶商的发展表明，徽商在近代并没有彻底衰落，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一些行业仍然保持着较强实力甚至还有所进步；但与明清徽商相比，近代徽商竞争力之削弱以及在中国商业版图中地位之降低是不争的事实。

【关键词】徽州；茶商；徽商；徽学

【中图分类号】K2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8）01-002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科举革废与清末民初乡村教师群体转型——以徽州为中心的考察”（课题号：COA120171）

【作者简介】梁仁志，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安徽芜湖 241002）。

明清徽商鼎盛时期，“徽人经商首重盐业……徽商之富莫过于盐商”^①。然而，自清道光中叶盐法改纲为票后，作为徽商中坚的盐商便一蹶不振，徽州茶商却在五口通商后出口贸易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徽商新的中坚。清末歙县知县蔡世信就说：“徽州商业以茶为大宗。”^②从“首重盐业”转变为“以茶为大宗”，徽商的商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徽州茶商在徽商中呈崛起之势。近代徽州茶商的发展既是传统徽商实力之延续，也是徽商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因此，了解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与新变，对深刻理解徽商的近代命运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学者在讨论明清徽商时对近代徽州茶商多有涉及，也有若干专文考察了近代徽州茶商^③。但已有研究或有所偏重，或不够系统，有些观点也值得商榷。鉴此，本文对近代徽州茶商略作系统考察，并对徽商衰落问题再作适当反思。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①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② （清）刘汝璈：《陶甓公牍》，梁仁志、李琳琦校注，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页。

③ 张朝胜：《民国时期的旅沪徽州茶商——兼谈徽商衰落问题》，《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刘芳正：《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与上海茶业》，《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彭景涛等：《承继与变革：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近代转型的历史考察》，《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周晓光、周语玲：《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之兴衰》，《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

一、近代徽州茶商之崛起

五口通商后，歙县茶叶开始大量外销，歙县茶商趁势崛起。同治年间，仅蕃村、芳坑就有本地人经营的外销茶号 8 家。民国时期，全县外销茶号多达百余家。著名歙县茶商吴荣寿专制外销茶，先后在屯溪开设 18 家茶号，年销数千担，最多时每年可达 2 万担，几乎占“屯绿”外销总量的一半，被誉为“茶叶大王”。歙县茶商除在徽州本土经营外，更在外地开疆拓土。光绪三十四年（1908），苏州茶业同业公会共有 46 户登记人会，歙县籍竟占了 40 户。清末民初苏州的六大茶业名店吴世美、严德茂、汪瑞裕、鲍德润、方裕泰、程德泰均为歙县人所开^①。北京的茶叶店也“以安徽歙县人最多”^②，据北京市茶业商会统计，1945 年有歙县人开设的茶叶店号 35 家，登记资金 49.585 万元，店员 544 人。其中最大的森泰茶庄，登记资金 7.21 万元，有店员 62 人^③。抗战前后，歙县人在杭州开设的茶行、店、庄多达 70 余家，浙江崇德、桐乡两县茶业也几乎被歙县人垄断^④。

近代婺源茶商也渐渐在婺源商人中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婺源木商后裔俞泰昌曾回忆说：“徽商那个时候茶业是第一，木材是第二，其他开典当，做其他生意是很少、很零碎的。”^⑤他的说法在地方志中得到印证。民国《婺源县志》卷 33《人物七·孝友七》、卷 42《人物十一·义行八》、卷 48《人物十二·质行九》为“庚申续编”，即民国庚申年（1920）在光绪九年（1883）所修《婺源县志》的基础上增补而成，以符“大致仍旧而不无增减”^⑥的编纂宗旨，故其叙事时间上下限当为 1844 年至 1920 年，所传“人物”几乎都是近代人。据粗略统计，其中有商人 615 名，除 273 人经营行业不明外，其余 342 人中，茶商有 108 人，几占 1/3，居于首位（二至四位的是瓷商 91 人、木商 90 人、墨商 11 人）。

近代黟县商人业茶者也颇多。如韩文治，“家本寒素，授徒应举。咸丰中游沪，遇粤人相交，契以巨资，俾治茶业于徽”。林道宏，“幼习贾，贩茶粤省多次，皆称职。嗣复营业于江西、祁门等处”^⑦。孙理和，“意切振兴国货，运红茶于海参崴境，志存推广华商”^⑧。江西九江在开埠后成为长江沿岸重要的外贸港口，民国时期黟县人在九江开设的茶叶店有 11 家之多^⑨。

近代绩溪茶商影响甚巨。如赫赫有名的徽商汪立政，14 岁到上海茶叶店当学徒，24 岁在沪南独创了著名的“汪裕泰”茶号，在上海茶号中独占鳌头。30 多年间，又在上海、奉贤、苏州、杭州各地设分号 9 处。其孙振寰更在美国、日本等国开设分店^⑩。

近代休宁、祁门两县茶商也是当地徽商之中坚。清末，休宁商业“以茶、木、盐、典、笔墨为主”^⑪。民国时期，休宁有茶行、茶庄数百家，屯溪镇更成为皖南乃至全国茶叶的集散中心和茶商聚集地。近代以降，祁门红茶誉满全球。休宁、祁门茶商在屯溪茶业经济繁荣和祁门红茶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① 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歙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281~282 页。

② 老侯：《商工职业和籍贯的关系》，《华北商工》1944 年第 2 卷第 2 期。

③ 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歙县志》，第 282 页。

④ 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58 页。

⑤ 俞泰昌：《一个徽商后代的回忆》，《史林》2006 年增刊第 1 期。

⑥ 民国《婺源县志·凡例》，1925 年铅印本。

⑦ 民国《黟县四志》卷 7《人物志·尚义》，1923 年刻本。

⑧ 民国《黟县四志》卷 14《杂志·文录·孙理和先生七旬寿序》。

⑨ 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黟县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第 318 页。

⑩ 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8 年，第 879 页。

⑪ 休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休宁县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237 页。

二、近代徽州茶商之新变

相较于传统徽州茶商，近代徽州茶商在经营地域、方式和理念上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也愈发紧密。这些表明，近代徽商并非一味墨守成规，他们也在与时俱进。

（一）经营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

近代以前，徽商的茶业经营主要以内销为主。其销售市场，在明代主要集中于南京、北京等城市及东北、华北、西北等北方地区；在清代前期仍以京津等北方地区为主，但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迅速发展起来。销售的茶叶品种也以是否适合国内消费者口味为主要考量。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后中外贸易形势的变化，徽州茶商开始致力于茶叶外销。由内销为主到外销为主的转折始于道光中叶，据婺源上晓起村《江氏祖谱》载：“在鸦片战争中，婺源绿茶取道五岭（金竺岭、对镜岭、羊斗岭、塔岭、新岭）至屯溪，至粤东，时谓之‘做广东茶’。彼时海禁既开，业此者无不利市三倍，如我邑荷田方氏、上溪头程氏、上晓起对河叶氏，皆因作广东茶而致巨富。……彼时邑人族人既多业茶于粤中。”^①据歙县知县何润生估算，光绪年间外销茶在徽茶中的比例已高达80%~90%^②，说明其时徽州茶商已完成了茶叶销售从内销为主到外销为主的根本性转变。

道光中叶以前，因清廷限定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所以经营外销茶叶的徽商均集中在广州一隅。有学者统计，光绪《婺源县志·义行》记道光至同治年间婺源茶商共55人，明确注明“业茶粤东”的有35人，占总数的63%^③。五口通商后，原先以广州为唯一外贸口岸的局面被打破，徽州茶商开始转而云集汉口、九江、上海等地。如婺源茶商齐宏仁，“少孤贫，以积累资与郎某在汉口合开茶行。辛亥革命军起于汉上，郎某以年迈归里，仁独力将货物保全，一无所私，仍与郎某重理旧业”；汪执中，“及长，业茶汉上，栽培后进极多”^④；程丽南、汪春荣还被推举为汉口商务总会会董^⑤。清末民初，婺源茶商李有诚，“偕友业红绿茶于九江，复就里中开设茶号”^⑥。上海更成为新的华茶集散中心和徽州茶商经营中心。与此相对应，广州的徽州茶商茶业经营中心的地位便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在民国《婺源县志》卷33、卷42和卷48所载的108位确知的茶商中，业茶广州者仅14位。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徽州茶商新的经营中心，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关系密切。五口通商后，一大批外国洋行纷至沓来，使上海“商业日形起色，于是郊外荒凉之地，一变为繁华热闹之场”^⑦。徽州与广州相距遥远，徽州茶商携茶前往，水陆交通颇为不便，且耗费繁多。而从徽州到上海则要便捷得多。徽州茶商一般在屯溪雇船，沿新安江东下，直抵杭州。在杭州过塘，经嘉兴、嘉善、松江、黄浦等地，到达上海。途中货物只需在杭州中转一次，与去广州相比，不但省时，各种费用也大为减少。同时，由于“汉口所特制之红绿砖茶因其有特殊之品质，专销俄国”^⑧，致使汉口茶叶市场被俄国商人所控制，“1918年因（俄国）国内发生革命，使俄人购买茶叶完全停顿，结果使中国之茶叶对外贸易衰落。加以中国内战1926年间其影响波及汉口，结果少数外人之茶叶公司，乃不得不退回上海”^⑨，遂使上海成长为全国最重要的茶叶对外贸易中心和徽州茶商的经营中心。

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1931年调查，“以帮别，上海茶厂徽、广两帮最占势力，本帮不过五六家。其他江西帮、绍帮、

① 转引自刘隆祥等《“婺绿”经济史》，婺源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婺源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第17~18页。

② 何润生：《茶务条陈》，刘锦藻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2《征榷十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本。

③ 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④ 民国《婺源县志》卷42《人物十一·义行八》。

⑤ 民国《夏口县志》卷12，1920年刻本。

⑥ 民国《婺源县志》卷42《人物十一·义行八》。

⑦ 李右之：《上海乡土历史志》第3课《五口通商》，上海：著易堂印书局铅印本，1927年，第3页。

⑧ 《华茶对俄贸易概况》，《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1卷第14期。

⑨ [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第55页。

甬帮更少。至于工人，则制绿茶者多徽帮，制红茶者多江西帮”^①。上海 57 家茶厂中，徽帮有 29 家，占了大半壁江山（表 1）。

表 1 1931 年上海茶厂一览表

厂名	经理	资本	机器马力（匹）	帮别
保昌第一厂	吴森荣	6000 两	7.5	徽帮
保昌第二厂	吴森荣		4	徽帮
成记	卓华谱	6750 两	7.5	广帮
有利	李仲坊	8000 元	7.5	广帮
星源	卓介业	3000 两	7.5	广帮
永兴	卓铎业	3000 元	7.5	广帮
永泰	彭有恒	6000 两	7.5	本帮
新鸿发	梁海寰	3000 元	7.5	广帮
兴德	鲍达扬	5000 两	7.5	广帮
昌记	钱子良	10000 两	6	徽帮
运通	陈宝书	4000 元	6	广帮
林馨祥	吴森荣	5000 元	6	徽帮
同德	鲍达扬	6000 两	9	英商
源利	郑鉴源	2000 元	5	徽帮
德记	程润记	5000 两	5	徽帮
新和兴	符子先	50000 两	5	徽帮
星星	吴森荣	4000 两	5	本帮
慎泰	王永咸	6000 元	5	本帮

①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上海之茶及茶业》，上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信托部，1931 年，第 48 页。

协昌泰	卓寿记	3000 元	5	广帮
同记新	吴森荣	3000 元	5	徽帮
德记	程润记	3000 两	5	徽帮
景记	孙景初	3000 元	5	绍帮
协和祥	庐家茂	4000 元	5	广帮
得利	唐善庆	6000 元	5	平水帮
大椿	程润记	5000 两	5	徽帮
同益丰	程炳宏	1600 元	5	徽帮
万成祥	汪礼齐	3000 两	5	徽帮
公兴祥	李华益	3000 元	5.5	广帮
泰记新	吴森荣	2000 元	4	徽帮
三元	庐家茂	3000 元	4	广帮
义同兴	俞霖生	4000 元	4	徽帮
聚生	江序东	3000 元	4	徽帮
同兴发	张发宝	3000 元	4	江西帮
勤余	张发宝	3000 元	4	江西帮
新昌	黄仲昭	3000 元	4	本帮
升记	庞宰并	2000 两	4	徽帮
聚兴发	叶德昭	2000 两	4	徽帮
元隆	裘定复	2000 两	4	绍帮
宝达祥	董镜复	2000 元	4	徽帮
永源	卓仲浦	2000 两	4	广帮
大德	石发生	2000 两	4	徽帮

英发	唐秉熙	4000 两	4	本帮
义森永	夏树馨	5400 两	3.5	徽帮
美大	黄愉庭	2000 两	3.5	平水帮
同昌祥	唐善庆	6000 两	3	徽帮
仁记	程敦培	2000 元	3	徽帮
瑞生	沈锦柏	2000 元	3	浙帮*
同发祥	孙子第	8000 元	3	徽帮
慎大	程春舫	5000 两	3	徽帮
公升	王启明	3000 元	3	徽帮
永和祥	陈治龙	3000 元	3	徽帮
荣泰	钱连顺		3	甬帮
瑞生泰	程书谷	3000 元	3	本帮
同益	李邦贤	3000 元	3	广帮
怡诚祥	孙子第	5000 两	3	徽帮
源鑫和	洪经五	7600 两	未详	徽帮
震昌	李福田	4000 元	未详	徽帮

(1) 资料来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上海之茶及茶业》，第 105~108 页。(2) *此处“帮别”原缺，据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等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下册，沈锦柏为浙江吴兴人，故补为“浙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575 页）。

上海的店庄业“大半属于徽州绩溪帮。五年以前，全市共不过百七十余家，现已增至二百以上，盖上海人口日增，销茶自亦增加也。茶店资本多不雄厚，自五百元至一万元不等”^①。1936 年，在上海仅汪裕泰茶叶店就有 7 家。需要指出的是，上海茶叶店大都以零售为主，而汪裕泰不仅零售，更“兼做批发及与洋庄往来”^②，即它不仅是茶叶店，还兼具茶叶批发商和茶栈性质。

上海的茶栈“以徽、广两帮为最多，良以徽州产茶最富，运沪甚多，粤商熟悉国际贸易，资本亦多雄厚故也。其他如平水

①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上海之茶及茶业》，第 50 页。

②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茶》，上海：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7 年，第 257~258 页、246~247 页。

帮亦占四处，此外杂帮则不过两家而已”^①。20家茶栈中徽帮有7家，占35%，居首位（表2）。

表2 1931年上海茶栈一览表

栈名	成立年份	经理	资本	地址	帮别
洪源永	1900	洪味三、洪仲煌	40000两	北京路清远里19号	徽帮
忠信昌	1907	陈翊周	100000两	博物院路26号	广帮
震和	1909	朱云卿	10000两	北山西路德安里	平水帮
同裕泰协记	1920	沈锦伯	12000元	江西路广福里	广帮
乾记	1922	胡德声、汪吟涛	60000元	七浦路豫顺里282	徽帮
谦和	1923	裘礼仁	10000元	北京路清远里	平水帮
益隆	1924	钱子良	20000元	北江西路桃源坊	广帮
公升永	1925	彭志平	40000元	北河南路671	徽帮
源丰润	1925	郑鉴源	40000元	东唐家街怡如里	徽帮
协慎祥	1925	卓希伯	25000元	天潼路470号	广帮
新和兴	1925	沈锦伯	50000元	江西路广福里	广帮
怡泰	1926	陈秉文	20000元	河南路如意里	平水帮
永兴隆	1927	宁慎安	60000元	天后宫天潼路470	广帮
慎源	1927	孙子第	50000元	北河南路	徽帮
仁德永	1928	汪礼斋	20000元	七浦路786号	徽帮
晋泰福	1929	翁约初	20000元	东唐家弄余顺里	杂帮
恒益协记	1929	朱邦贤	20000元	西武昌路383号	杂帮
永利	不详	梁奠邦		江西路B126号	
谦益	不详	谢蓉卿	10000元	江西路三和里13号	平水帮
永盛昌	不详	唐廷螯	48000元	七浦路恒庆里1027	徽帮

资料来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上海之茶及茶业》，第102~103页。

（二）经营方式从重运销转向重产制

美国人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说：“就一般而论，中国茶商极为守旧。……中国茶商在汉口有一茶业公会，但外国出口商实觉无法劝醒若辈，使其于业务改进上采取一致行动，例如要求若辈改良装茶用之木箱之质料而迄无效果一端即可概见。中国茶业界中有许多人一味依赖外国出口商代为用铁皮与篾席重加捆扎，而不思自己改用坚实之包装。”^②传统中国茶商往往只关注茶叶的运销环节，仅寄希望于通过贱买贵卖谋取利润，对茶叶的产制环节几乎完全置之不理。这就使得茶商资本无法进入茶叶产制环节，加之茶农基本毫无资金可言，茶叶改良便无从进行，茶叶品质遂无法提高，茶叶产品的附加值也不能得到较大提高。故近代以前的徽州茶商经营数百年，而徽茶改良却并无多大进展。近代以后，徽州茶商开始重视茶叶产制，祁门红茶与

①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上海之茶及茶业》，第43页。

② [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第13页。

黄山毛峰的创制就是徽商资本进入徽茶产制环节的重要成果。

祁门在清同治以前只生产绿茶和半发酵的安茶。光绪元年（1875），祁门贵溪人从江西修水请来茶师仿“宁红”改制红茶获得成功。与此同时，黟县人余干臣在至德仿“闽红”试制红茶获得成功，并在光绪二年到祁门历口开设茶庄，引导茶农制造红茶。祁门贵溪人胡元龙也于光绪八年在当地建厂生产“胡日顺”牌红茶，“运售汉口，大获成功”^①。此后，祁门红茶制法不断推广，生产工艺日益改进。“光绪三十一年，全县茶商已逾百余家，红茶产量达到6万余箱。民国二年和四年，祁门茶商李训典被安徽实业厅委任为徽属茶商代表参加巴拿马博览会和意大利都朗博览会，推销徽属红茶和绿茶，为‘祁红’在巴拿马赛会上获得头等奖凭、奖图和商标，走上国际市场作出了贡献。”^②由于俄国人偏爱红茶，祁门红茶在汉口销路颇畅，“民九以前，大都运汉销售，迨后以汉市茶叶贸易衰落，遂转移于上海”。祁门红茶转销上海后声誉更隆，与婺源绿茶齐名，遂有“祁红婺绿”之称，“沪上红绿茶价，均以此二者为标准”^③。由于祁红“十余年来质味之转变，颇为洋商所重视，累年经营祁地茶业者，大概有赢无绌，尤以去岁危险年头沾利最巨。故今年祁地栈号之纷起，较旧更呈热闹。沪上各茶栈，以去年祁庄获利，洋商对祁茶，需要至殷，莫不群集视线于祁南一路。除由本栈在祁设立庄号专办外，驻祁分栈营业，亦扩大范围，竞争接客设栈”^④，从而推动了祁门红茶沪市价格的不断高涨，并赶超婺源绿茶。以1929年至1933年为例，这5年间，祁门红茶售价仅1929年低于婺源绿茶，其余4年均高于婺绿^⑤。

黄山毛峰创始人为歙县漕溪人谢正安。正安出生于徽商家庭，早年在外地经商，咸丰时“粤匪窜徽，家业为之荡尽……当子然寡助之时，处家无立锥之地”，只得返回老家漕溪，靠种茶耕田为生。同治四年（1865）后战事渐平，徽州商业渐渐复苏，他开始重操旧业，在家乡收茶制茶，并在黄山云雾茶的基础上对所收茶叶大加改良，制成“黄山毛峰”。由于漕溪地处黄山脚下，所产茶叶质好味醇，以此处茶叶制成的黄山毛峰外形略卷，形似雀舌，绿中带黄，并带有金黄色鱼叶，被誉为“黄金片”，在安徽及上海各地甫一上市便备受好评，一炮打响，一时供不应求。正安抓住时机，在漕溪、琳村及屯溪等地开设谢裕大茶行，扩大茶叶收购和加工范围。为拓展海外市场，正安又在上海及东北营口等地开设谢裕大茶行分号，“数十年经商得意，名震欧洲四五载”^⑥。

近代徽州茶商在茶叶的包装器具上也开始下大功夫。如黟县人赵有贵，“幼孤贫，随母赁舂糊口，长习商，旋赴屯溪学锡罐业。锡罐者，储茶之器。徽茶为欧美所贵重，而屯溪又徽茶聚汇之地，故锡罐业颇盛，有贵铢积寸累，遂开专号，家称小康”^⑦。这看似是茶业的副业，但它不仅增加了茶叶的附加值，还巧妙地将茶业流通领域中的资本转移到了生产领域。

无论是改制祁门红茶、黄山毛峰，还是创制锡罐，都是近代徽州茶业经济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因素”^⑧，标志着徽州茶业也一步一步迈上了现代化之路，展现了近代徽州茶商的与时俱进。

（三）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更加紧密

① 胡益谦：《祁门红茶生产史略》，祁门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著：《祁门文史》第1辑，1985年，第112页。

② 程成贵：《祁门旅外商业特点初探》，祁门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著：《祁门文史》第2辑，1988年，第82页。

③ 李焕文：《安徽祁门、婺源、休宁、歙县、黟县、绩溪六县茶叶调查》，《工商半月刊》1936年纪念号。

④ 《祁门红茶之今昔》，《安徽建设》1931年第3卷第5号。

⑤ 李焕文：《安徽祁门、婺源、休宁、歙县、黟县、绩溪六县茶叶调查》，《工商半月刊》1936年纪念号。

⑥ 《清宣统二年谢正安闽书》，转引自张斌《“黄山毛峰”创始人谢正安家族的两份闽书》，《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⑦ 民国《黟县四志》卷7《人物志·尚义》。

⑧ 吴承明指出：“在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新的经济因素及其运行方式的出现与发展，如果一代一代都是重复旧的运作，那不研究也罢。”（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4页）

徽州有谚云：“茶叶两头尖，三年两年要发颠。”^①由于近代徽州茶业几乎完全以出口为导向，对市场的依赖度非常高，故其经营风险也颇大。在近代，茶叶从生产者到国外消费者手中，须经过许多中间环节：茶贩子向各地茶户收买经过粗制的茶，售于茶行；茶行售于土庄茶厂或经茶客之手售于茶号；土庄茶厂或茶号再售于上海茶栈；茶栈售于洋行；最后经由洋行等运销到国外消费者手中^②。茶号资本之来源，“大致可分为贷款、附本、私资三部。贷款为茶栈、钱庄贷放之资金，附本为合伙者附加之资本，私资为掌号本人所出之资本”^③。徽州六县之茶号，“其资本大半系临时集股而成，且均借自上海及九江之茶栈，每家资本多则五万元，少则二万元”^④。茶栈一般开设于通商口岸，为茶号与洋行间之贸易中介，“故为华茶输出国外之居间商。无论土庄茶及路庄茶不能直接与洋行交易，均须经过茶栈之手，其营业为代客买卖，从中抽去佣金（名分为值百抽二）”^⑤。

由于茶号对茶栈有借贷关系，这就为茶栈支配茶号提供了可乘之机：“考诸历年茶栈收茶办法，向系事先贷款与产区各茶号，由茶号向茶农收买茶叶，凡该茶号向茶农收得之茶叶，均归贷款之茶栈销售与各洋行出口。茶栈贷款方法系以茶号收茶数额为标准，先付现款若干及期票若干，茶号即赖以周转。”^⑥其间，茶栈的贷款本息及“受洋行方面之种种勒索转嫁与茶号，运输以及其他种种陋规，名目繁多，均于茶价中一并扣除之”^⑦。与此同时，一些茶厂，如屯溪之精制茶厂等，“除小部分自资经费外，大部依赖沪上茶栈贷款”^⑧。但对茶栈来说，其贷给茶号和茶厂之款也并非自己所有，而是向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借款，月息一般为8厘，而后茶栈再将款贷给茶号、茶厂，月息则增为1分5厘，转手之间就可以获得7厘的月息收入。这个居间差价茶栈提供了丰厚的利润，故“每当新茶上市之前，沪上各茶栈，均派员来电，主持接客放款事宜”。1933年，常驻屯溪的上海茶栈有8家，总放款金额为250万元（表3）。而当年屯溪的67家茶号资本总额不过335万元^⑨，可见，茶号资本总额的74.6%都是从茶栈贷款而来，茶号对于茶栈的依附程度可想而知。由于茶栈之款又是向钱庄、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来，故“茶栈实为内地茶号与上海银钱业之承转机构而已”^⑩，这就为金融资本对徽州茶业经济的渗透和控制创造了条件。

表3 1933年上海茶栈驻屯溪经理情形及贷款情况

茶栈号牌	经理姓名	帮别	贷款估计（万元）	贷款手续
忠信昌	曹政卿	广帮	30	多系信用放款，须出具借款凭据，言明领款若干，利息若干，无论分为几字号，须全批交该栈出售
慎源	叶凤山	徽帮	32	
洪源永	江连浦	徽帮	3.5	
永兴隆	孙络尧	广帮	30	
源丰润	汪秋圃	徽帮	25	
公升永	程宝长	徽帮	20	
永盛昌	汪旭初	徽帮	18	

① 吴觉农编：《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业》，南京：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第4页。

②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茶》，第238页。

③ 吴觉农等：《中国茶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04页。

④ 李焕文：《安徽祁门、婺源、休宁、歙县、黟县、绩溪六县茶叶调查》，《工商半月刊》1936年纪念号。

⑤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茶》，第241页。

⑥ 《皖省统制红茶及茶栈停兑问题之经过》，《国际贸易情报》1936年第1卷第11期。

⑦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茶》，第241页。

⑧ 铭之：《二十七年屯溪之茶业》，《茶声半月刊》1939年第2期。

⑨ 吴觉农编：《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业》，第4页。

⑩ 吴觉农等：《中国茶业问题》，第211页。

仁德永		徽帮	15
合计			250

资料来源：吴觉农编：《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业》，第5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上海之茶及茶业》，第102～103页。

1933年常驻屯溪的8家上海茶栈中，除2家广帮茶栈外，其余6家均为徽帮茶栈，其贷款额估计为190万元，约占8家茶栈放款总额的76%，说明徽商资本牢牢地控制了徽州茶业。这也使得上海的钱庄、银行等金融资本通过茶业贷款方式，既控制了徽州茶栈商人，也巧妙地控制了徽州茶业经济。徽州茶商、徽州茶业经济与金融资本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三、余论

在讨论徽商衰落问题时，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以后徽商就彻底衰落了，甚至“几乎完全退出商业舞台”^①。从近代徽州茶商的发展状况

来看，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研究认为，“光绪中叶以后……中国茶叶的出口贸易越来越不景气，徽州茶商也随之而一蹶不振”^②。这种观点显然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有学者将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称为“中兴”^③，而事实上，近代徽州茶商无论是在经营地域、方式和理念，还是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具备了一些近代新式商人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徽州茶商的发展绝不能简单地视为传统徽商的中兴，而应是徽商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这正是徽商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

但问题是，近代以后，为何徽州茶商走上了新的发展之路，并在徽商整体衰落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崛起之势？揆诸史实，近代徽州茶商所经营的茶叶更多以徽茶为主，他们主要是依靠了徽州本土的资源优势（徽州木商也是如此），而这种天然禀赋的资源优势是市场环境变迁较难改变的。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等认为：“所谓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④尽管近代徽州茶商已经开始注重改进产品包装和宣传、改制祁门红茶和黄山毛峰，并将新式机器用于茶叶的产制环节，实现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扩张，即在发展过程中采用了“新的经济因素”，但它仍旧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从这个角度看，相较于明清徽商在盐、典等业的叱咤风云，近代徽商在茶业领域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竞争力之减弱。故一些学者认为近代徽商并未衰落，这种看法显然也不妥当。

综上，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表明，徽商在近代并没有彻底衰落，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一些行业仍然保持了较强实力甚至还有所进步；但与明清徽商相比，近代徽商竞争力之削弱以及在中国商业版图中地位之降低是不争的事实。^⑤

① 李则纲：《徽商述略》，《江淮论坛》1982年第1期。

② 王廷元、王世华：《徽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③ 彭景涛等：《承继与变革：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近代转型的历史考察》，《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④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页。